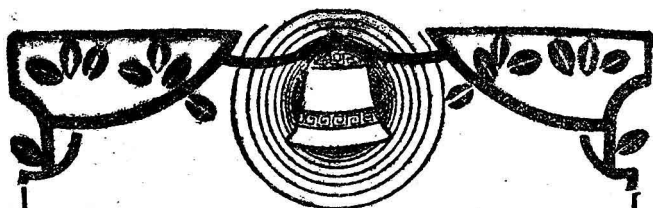


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  
文化運動叢書

# 中國戰時學術

孫本文等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滬初版

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  
文化運動叢書第八種

中國戰時學術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三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2095)

著者

謝幼偉 程仰之 陳獨行  
王平陵 陳盛清 蕭孝驥  
瞿菊農 夏炎德 盧于道  
孫本文 徐文珊 郝景盛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 序

在一般人的想像裏，我國抗戰了七八年，因交通的阻塞，印刷的困難，國外資料的難於獲得，學術上必將退步，然事實恰與此相反，我們有見及此，特約全國專家學者將學術上的各部門作一總檢討，其結果使我們意外地興奮。我國的各種學術，不但沒有退步，而且有着長足的進步，較之數十年來的學術進展有過之無不及。謝幼偉先生在檢討七年來之哲學後說：「我們不要以為這七年來的抗戰把中國哲學的進展阻礙了，實際上，這七年來的中國哲學，比起中國任何一時期來講，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的說，中國哲學是進步了。這七年的抗戰，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的新生。」郝景盛先生檢討自然科學的結果說：「在這七年中，我們的科學家，爲了國家之富強，民族之生存，社會之建設，是個個都能守着崗位，埋頭苦幹，無論生活環境困苦到何等地步，仍按步就班，在那裏努

力工作。所以這七年間科學進步與貢獻，比起過去三十年來，在質在量皆有增無減」。盧子道先生關於科學的成就更具體地說：「在近二三年來，一方面由於國際及國內之助力，又一方面由於時代關係，略有進展。在古生物學界有陸豐龍及原始哺乳類動物之發現，在植物學界有橡膠植物（薛荔）之發現，昆明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製造各種鏡頭，皆是聲大者；至於內地礦產之發現，雖開採有待，對於國家皆為抗戰期中之重要科學收穫。在醫藥方面，嘉定一帶瘧病流行，今聞同濟醫學院杜公振教授已獲得治療方法，若然，這也是重要貢獻。至於工礦界近年來大小發明有三百起，在將來工業發達後，未必每件發明都有價值，但亦不失為今日科學界的一番努力。」至如在社會學，政治學，教育學，法律學，經濟學，地理學，心理學，史學與文學沒有一種學術不在進步。我們祇要詳閱各專家學者的報告，就可瞭然。

需要為學術之母，中國這七年來固然在被封鎖的現狀之下，而仍能繼續發展者，就由於需要。孫本文先生說：「抗戰以來，全國社會學者幾乎全數來到後方從事於教學或實際

工作。雖則戰時圖書設備略感欠缺，而同人研究精神並不稍受影響。且因戰時關係，多數學者除從事於學理研究外，更能對抗戰建國的理論與實際問題，作多方面的檢討。故七八年來，全國社會學界顯然表示一種新的趨向：就是大家注意於社會學應用的研究，尤其社會問題，社會事業，社會行政與社會建設的研究。」瞿菊農先生對近七年來教育之進步也有同樣的意見說：「七八年來的抗戰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事。在這七八年中，中國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正在加速的變動。在此變動之中，各部門的學術研究都不能不因需要之不同，條件的變換而受影響。教育學是與人生關係最密切的學科之一，亦不能不受此種大變動的影響。當此種動盪的時代，教育學不得不一面適應當時的要求，為實際的設施求得理論的學術的基礎，為實際上發生的問題推求解決，一面更要對過去與現在有批評的檢討，重新估定其價值。」我國其他戰時學術的進步，莫不因這「實際的需要」而來。以大體論，中國的戰時學術可以說達到了蔣主席在「中國之命運」裏所指示的「務使學術切於人生的日用，文化歸本於建國的基礎」的目的。

我國戰時學術在進步，且這進步由國家民族的需要，這是我國學術的轉捩點，這轉捩點將為中國新學術的基石，所以我們很榮幸的將這部「中國戰時學術」一書貢獻給讀者。不過因各專家學者分散各地，約稿需時，又因印刷困難，以致出版時間上不免延遲。好在本書內容並無時間限制，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張道藩序於渝

# 目次

|                        |          |
|------------------------|----------|
| 抗戰七年來之哲學·····          | 謝幼偉（一）   |
| 七年來的中國抗戰文學·····        | 王平陵（一九）  |
| 抗戰七年來的教育學·····         | 瞿菊農（三七）  |
| 七年來的社會學·····           | 孫本文（六四）  |
| 七年來之政治學·····           | 程仰之（七七）  |
| 抗戰七年來之法律學·····         | 陳盛清（九〇）  |
| 抗戰七年來之經濟學·····         | 夏曉德（一〇七） |
| 抗戰以來中國史學之趨向·····       | 徐名珊（一二三） |
| 抗戰七年來我國的地理學界及其出版物····· | 陳獨行（一三五） |
| 抗戰以來的心理學·····          | 蕭孝嶸（一四七） |

目次

二

|                |          |
|----------------|----------|
| 抗戰七年來之科學界····· | 盧子道(一六五) |
| 抗戰七年來之科學·····  | 郝景盛(一八一) |

## 抗戰七年來之哲學

謝幼偉

在烽火滿天，四郊多壘之際來談哲事，這是中國哲人的常事，也是中國哲人的本色。王陽明在討賊剿匪的時候，並不停止他的講學，反而，他似乎還講得更起勁。普通人也許以爲哲學的思索，必在四顧寂寥，萬籟無聲的環境內，方能產生；但中國哲人則以爲「境寂我寂，已落一層」。必境不寂，而我能寂，才算顯出了哲人的本領。所以作者提起筆來談「抗戰七年來之哲學」，並不算希奇。我們不要以爲這七年來的抗戰，已把中國哲學的進展阻礙了。實際上，這七年來的中國哲學，比起中國任何一時期來講，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的說，中國哲學是進步了。這七年來的抗戰，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的新生。

我說，「這七年來的抗戰，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的新生。」也許有人會懷疑作者這一句話。有人會認爲作者這一句話，未免過於誇張。但假如我們明瞭中國哲學的過去，明瞭中

國哲學的傳統，同時又能把這七年來中國哲學界的主要譯著，細心理會一番，我想他或可以同情作者這一句話。所以作者本文的任務，一方面在把中國哲學的過去，略加說明看其優點何在？及缺點何在？另一方面才把這七年來中國哲學上的重要著作，提出介紹，而指明其進步之所在。這樣去把中國哲學的過去和現在對比一下，即能顯示作者這一句話是有根據的。

談到中國哲學的過去，這當然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明。但作者的目的並不是要把中國哲學的過去作詳盡的論究，而是要把中國哲學的過去所表現的主要特徵作概括的敘述。這樣便有簡略的可能。

中國哲學的過去，其主要特徵，作者認為第一在重體驗或重力行的精神。中國哲學家從不把文字語言當作哲學，至低限度，中國哲學家決不認為寫了幾本哲學書，即算盡了哲學之能事。孔子即主張無言之教，所以他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則為哲人者，又何必多言呢？孟子也是一樣。有人說孟

子好辯，孟子即回答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因此，他們縱有所言，縱有所寫，他們都是不得已的，決不是認為他們的哲學，即在文字語言上。他們都可以說是拿他們的生平和人格來代表他的哲學，來實現他們的哲學。他們的哲學都是從體驗，從力行而獲得的。孔孟這種重體驗，重力行的精神，歷代哲人，皆繼承而勿失。例如，以宋明的理學家而論，他們的著作，似乎很多，可是他們的著作却大部分是以語錄和書札為主，這可以證明他們的著作，都不是有意的，也都是不得已的。他們講哲學，一方面要自己體驗，要自己力行，一方面也要他人體驗，要他人力行。哲學的終極目的，自中國哲人看來，全在養成我們自身以及他人的人格，而上躋於聖賢的領域。哲學不能達此目的，則這種哲學是浪費的。這種態度，這種精神，和西洋哲學比起來，可謂恰恰相反。西洋哲學是重文字，重理論的。作者可以引一段現代英哲柏烈得萊（F. H. Bradley）的話來加以證實。柏氏說：「一切哲學的任務，是在「理解存在」，而道德哲學的任務，則在理解存在的道德，不是去製造道德，或指示方針去製造道德。像這種設想（按即製造道德的設想），簡直是可笑。

一般的哲學不是在預期各種科學的發明，也不是在預期歷史的進化。如宗教哲學，不是在創造新宗教，或宣傳舊宗教，而只是去理解宗教的意識。如美學，不是要產生美術的作品，而是在將所發現的美加以理論化。如政治哲學不是要參加對於國家的陰謀，而是在理解國家。一樣的，倫理學也不是要造成世間爲道德的，而是在將世間流行的道德構成爲理論。〔見所著：倫理學研究，原書二版一九三頁〕換句話說，一切哲學都是理論的，而不是實踐的。試問中國過去的哲人曾贊成這種主張嗎？他們會說，或敢說，他們的倫理學，「不是要造成世間爲道德的」嗎？這是中西哲學的根本差異處也是中國哲學的唯一優點。中國哲學的過去，作者認爲第二種主要特徵是在其方法。中國哲學的方法是直覺，也可以說是武斷的。中國哲學缺乏一種思辯的精神。缺乏一種邏輯的訓練。過去中國哲人對於他們所提出的主張，很少用理論去加以證明，也即是很少提出他們的理由來說明他們的主張。他們只是武斷的肯定他們的主張。例如，易經上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但爲什麼天行是健呢？下面就沒有說出理由。又如孔子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這是對於宇宙日新，刻刻變化的主張，但也沒有說出其所以然來。即在宋明儒者，依然沒有拋棄這種態度。周子太極圖說，開口就說，「無極而太極」。然爲什麼是無極而太極呢？無極和太極的論證在那裏呢？我們也找不到。所以，中國哲學差不多可以說，只是一套武斷肯定的言論，而沒有或絕少，理論上的證據。他們的哲學，恃他們的直覺。可是直覺不一定可靠，也是常常不一致的。有時的直覺如此，有時的直覺又如彼。結果他們的言論便極不一致，往往自相矛盾而不知。他們對於思想系統的完整，對於理論的嚴密，對於分析的精細，都不十分注意。隨他們的興之所之，東說一句，西說一句。有時說雖說對了，却沒有說出理由來。這是直覺法的缺點。徒恃直覺，而沒有邏輯的控制，作者認爲是不夠足的，有時且是危險的。因一人有一人的直覺，若我直覺得是這樣，而他人直覺得是那樣時，不特邏輯，便沒有方法去批評他，而他人也不會心服的。明代王學末流的放蕩，主要原因可以說就是徒恃直覺所造成。因此，我們不能不說，這一特徵乃是中國哲學的缺點。

第三種中國哲學的主要特徵，作者認爲還是在它的態度。中國過去哲學的態度是一種

宗教的態度。這話我想有不少人會加以否認，會認為在中國傳統思想上根本就沒有宗教這一回事。中國哲學家自始就對於宗教不感興趣。如何能說中國哲學家的態度是宗教的態度呢？但作者的意見是，不管中國傳統思想上有沒有宗教這一回事，也不管中國哲學家對於宗教有沒有興趣，可是中國哲學家的態度始終是宗教的。這話自然須加說明，方能使人信服。作者所謂宗教的態度，是指一種衛道的態度而言，指一種「言必稱堯舜」的態度而言。宗教家對於他們的教主是絕對尊敬的，對於教主所說的一切是絕對不懷疑的。因此宗教家對於他們的經典和教義，只有注釋，只有說明，只有發揮，而決不許批評或反對。有時宗教家縱具有個人獨創的見解，明白和教義不同，但他總不敢說明是他們自己的見解，反而必引經據典，以自行表明他的見解是得自經典和教義的。他們不這麼做時，他們即會有「異端邪說，離經判道」的罪名。他們每一人都是以衛道者自居，都是根據經典和教義去發表自己的見解和批評他人的見解。這就是宗教的態度。明白了這點，便不難看出過去中國哲學人的態度是不是宗教的。這種態度可以說是即自孔孟開其端，而秦漢以後為最甚。孔

孟之言必稱先王，法堯舜，就是這種態度。明明是自己的「道」，而必說是先王之道，明明是自己的話，而必說是堯舜文武周公之言，這不是宗教態度是什麼呢？至漢注唐疏，專以解釋經典爲事的，更不必說。到了宋明理學家，他們本來有不少是自己的見解，可是他們也不敢說是他們自己的見解，而必託諸四書，託諸孔孟。他們彼此間的互相批評，也不是就各人見解，本身的正確與否來判斷，而只說，你的話不是聖人之言，或他的話不是聖人之言。甚而，他們明明對外來的佛教，已有所採納，却不惟不肯承認，反扳起面孔來「呵佛罵祖」，去作其衛道的工作。這不顯然是宗教家的態度嗎？作者並不是認爲宗教態度完全不對，但自哲學來說，這總是一種缺點。

總括的來說，中國哲學的過去，其精神是力行的，其方法是直覺的，其態度是宗教的。這其間有優點，也有缺點。現在我們可以轉而看看這抗戰七年來的哲學，究竟有沒有保存過去哲學的優點或改正其缺點。這樣就可以知道這七年來的哲學，究竟有沒有進步，或可不可以算是新生。

抗戰七年來，中國哲學上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蔣主席的一篇演講。這演講名叫做「行的道理」或「行的哲學」。這是一篇極重要的演講。這是抓住了中國哲學的精神而提出加以發揮的演講。這篇演講，主張以力行爲哲學的中心。認爲「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間，沒有一天可脫離「行」的範圍，可以說人是在「行」的中間而充實了人格，而提高了人格，一切聖賢豪傑，革命志士，因爲有目的，有決心的去行，所以能達到他們的志願，完成最高尚的人格」。然什麼是行呢？『所謂行祇是天地間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也就是我所說的「實行良知」。易經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話，就是這種哲學的根據。因爲天體是運行不息的，而人和天，並非異物，天的本性，即是人的本性，所以人當法天而力行不息。一個人若認識了自己的本性，他便能行乎其不得不行，以行去實現他的人生。惟行才能認識宇宙，亦惟行才能實現人生。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孫總理的知難行易說，都是認識了這點才提出來的學說。他們的意思都是要叫人去力行。』蔣主席提倡力行哲學，可謂有根據，有淵源，而決不是杜撰的。

蔣主席「行的道理」發表之後，國內營人起而參加討論的自然不少。但其中最具有價值的一本書，對力行哲學確有認識，確有發揮的，實爲賀麟先生所著的「知難行易說與知行合一說」。這部書係去年十二月青年書店出版的。國內學者對於這一部書似乎還沒有十分注意。實際上，這是研究力行哲學的最好一部書。賀先生從純哲學的立場，把知難行易說和知行合一說，加以一番理論上的證明和闡發。他指明前說不惟和後說沒有衝突，而且前說實是後說的一種新看法，且有所補充的。他認爲 孫總理也可承認知行合一，但「他要達到的知行合一，顯然不是道德修養上的王陽明式的當下直覺的知行合一。他雖說反對兼理論家實行家於一身的不知分工的辦法，但他決不會反對求知行合一的努力，決不反對致良知」。結末，賀先生乃提出 蔣主席的力行哲學，而加以解釋。他認爲「蔣先生的行的哲學，乃是於王陽明的哲學，及 中山先生知難行易說，灼然見到其貫通契合處，加以融會發揮而來。」他重指出 蔣主席之所謂行，在知識論上來說，是包括知在內的。「換言之，行乃知行合一之行，非離開知而獨立之行，非盲目冥行之行。」在本體論上來說，「